

# 艰难的起步:1938年美国对华 政策透视

· 王建朗 ·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年半中，美国对中国有同情，也有冷漠；对日本有斗争，也有妥协，但其总的趋势是一步步朝着援华制日的方向发展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这一年中，美国对于日本的称霸野心、中国的战略地位及美国的远东战略的思考，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后来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在这一年中均已提出。正是在这种战略思考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迈开了援华第一步。

美国史学家沙勒(M. Schaller)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曾这样描绘过当时的中国的形象：“在三十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仍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中国人和大多数亚洲人一样，在美国人眼中只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人们”。从贸易数字上来看，似乎也是如此，当时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尚未超过美国全部出口额的百分之三。<sup>①</sup>毋须解释，对于自由经济国家来说，这一比例通常是与国民的关注程度成正比的。总之，这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尚未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中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缺乏足够的重视，可以说，直到1937年中，美国尚未形

<sup>①</sup>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

成一个明智的稳定的对华政策。对于卢沟桥事变和中日间全面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缺乏充分的准备，仓促之间，它难以提出深思熟虑的对策，形成一个适应新形势的远东外交新方针。因此，美国对远东战争采取了一种传统的中立国的谨慎姿态：中立，敦促双方和解，尽可能地保持其在华利益不受或少受侵犯。在舆论上，美国也对日本作了一些批评，但其基本立场仍是中立的。正如国务院远东司长亨培克（S. Hornbeck）所建议的那样，美国“竭力注意只发那些有助于缓和之言，避免说可能触怒冲突中任何一方之话”。<sup>①</sup>在物资援华或制裁日本等实际行动方面美国均未采取任何措施。同时，它对日本侵犯其在华权益的行为也力持妥协态度，不愿扩大事态。甚至当发生了日机炸沉美舰“帕奈号”这样严重的事件后，美国仍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拒绝了英国主张联合采取海军行动的建议，满足于以日本的道歉和赔偿了结此事。而在美国历史上，证据并不如“帕奈号”事件确凿的“缅因号”军舰炸沉事件曾经引发过一场美西战争。

一般说来，在战争之初对交战双方持中立政策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弹性政策。然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在远东拥有重大战略利益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来说，听任局势自行发展的中立政策却并非善策。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对本国的远东政策重新进行仔细的考虑，而寻求一种更为明智的对策。这一进程首先是由身在远东现场的美国外交官和军界人士所推动的。他们在1937年底对日本在中国行动的最终目的及其恶果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警告，并由此对中国的战略作用开始进行重新估价。

“帕奈号”事件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 T. Johnson）指出，日本袭击美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目的与它要在中国获胜的目标完全是两码事。他认为日本的目的在于消灭“西方在中国人间

---

<sup>①</sup>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年，第3卷，华盛顿1954年版（以下简称FRUS，后列数字分别表示年、卷、页数），第280页。

的一切影响”。他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坚决的对策，否则，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他指出：“如果我们要得到尊重，我们就必须准备战斗。”<sup>①</sup>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H. E. Yarnell）则指出，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他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亚内尔在193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他主张美国应立即着手援助中国，“这不仅是为了那些高尚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缘故，而且也为了有机会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贸易，因为在这样的援助下形成的稳定局面会带来扩大的市场。”亚内尔警告说，如果美国不采取措施阻挡日本，“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sup>②</sup>亚内尔的这些报告曾在国务院、白宫班子以及军方高级官员中传阅。

在对中国抗战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战略意义逐渐认识的同时，与之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抵抗能力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南京失陷后出现的危机而继续坚持下去，这为美国对中国的重新认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中日战争刚开始时，许多外国观察家皆对中国持悲观看法，以为最多二、三个月，中国就要失败。然而，战争的发展并未如这些人所料。尽管中国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毕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构想，迫使日本陷入其无法预料的持久消耗战中。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事态，罗斯福要求即将前往中国就任驻华使馆助理武官的卡尔逊上尉（E. F. Carlson）特别为他搜集情报。他的情报不必经过正常的外交系统或军方的渠道，可直接由总统秘书负责传递。在1938年中，为了研究中日

① R. D. 布希特，〈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1925—1941〉（R. D. Buhite, *Nelson J.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第135页，东南辛1968年版；〈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2页。

②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页。

战争的状况和经验，了解中国的抵抗能力，美国驻华武官处的10名军官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他们经常出现在中日战争的前线，卡尔逊甚至还进入共产党统治区进行了考察。

1938年春夏，美国在华军事观察人员陆续向国内发回的报告，开始表现出对中国军队战斗力和战争发展状况评价的某种变化。3月31日，卡尔逊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表示了他对中国军队的比较乐观的看法。他在该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中国军队正飞快地得到改善。中国士兵仍然优于日本士兵，但军官需要参谋业务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们现在正得到这种训练。”他认为，只要中国能获得外国的贷款和战争物资，能维持对日统一战线并平息那些不顾一切代价的主和派，中国就能够继续抵抗。<sup>①</sup>

美国驻华武官处向美国军方所发回的许多报告也认为，战争已处于长期态势，日本不可能迅速战胜中国，中国现时也无力收回失地。他们认为，“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时刻还很远”。史迪威武官（J. Stilwell）1938年3月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指出，中日战争正逐渐发展成为一场长期消耗战，中国有可能最后赢得战争。日本即使占领了武汉以东的全部中国东部地区，也许还不足以征服中国。<sup>②</sup>武官处在193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对中日战争作了这样的评论：“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无疑，他们比战争开始时要好得多），更因为日本人的扩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不能发起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人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他们相信，“日本苍蝇最终使它自己缠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sup>③</sup>

① D·斯奇威主编，《罗斯福与外交事务》（D. Schew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Policy*），第10卷，纽约1969年版，第290页。

② FRUS, 1938, III, 116.

③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国，1911—1941》（《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缩微胶卷第10卷，第0694号。

在美国国务院内，人们也开始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在这一政策讨论中，远东司的范宣德（J.C. Vincent）所提出的并在国务院官员中广泛传阅的备忘录十分引人注目。范宣德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致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以及其它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根据这一认识，他建议在不致卷入战争的限度内，美国“现在不应放过任何增强中国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以阻碍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的机会”。该备忘录并提出5项具体措施，其内容主要为：重申不承认主义；劝阻向日本或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任何政权及机构提供借款或信贷；探讨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可能性；限制对日本的进出口；与其它有关国家政府协调行动。

针对一些人一味害怕卷入中日冲突的想法，该备忘录指出，过去的经历表明，只有中国的主权得以保存，美国的权益才可能继续存在，而如果日本军国主义不被击败，中国的主权则无以保存。因此，从长远来看，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被击败，美国在远东的卷入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军国主义富有侵略性。1931年它并未在满洲停住脚步，一旦它控制中国，它也不会在中国停住脚步。它将会向南方发展，从而与美、英、荷、法等国发生冲突。因此，备忘录指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成功，我们卷入的机会将显著地大于因我们现在向中国提供适当的援助而被卷入现时冲突中的机会。”与一般时论不同，作者的结论是，对华援助将比袖手旁观更少卷入的可能。<sup>①</sup>应该说，这一具有远见的认识是美国对华政策思路发展的一个飞跃。

这时，对于政府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公众舆论也日益同情和关注中国，对日本扩大侵华深感不安。在1937年8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55%的受测者表示对中日两国都不同情。而到1938年夏季，情况就不同了。当人们回答“日本侵略中

---

<sup>①</sup> FRUS, 1938, Ⅱ, 236—237.

国”、“德国占领奥地利”、“西班牙的外部干涉”等军事侵略行动，哪一件最令人不安时，回答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人数位居第一。<sup>①</sup>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前不被注意的中国，现在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开始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 二

在认识到援华抑日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开始发生变化，由注重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卷入冲突转向在避免卷入冲突的前提下，怎样尽可能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

罗斯福政府的这一态度，首先在是否对中日战争适用中立法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帕奈号”事件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日在华的冲突会导致美国卷入战争，因而要求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罗斯福政府在国会积极活动，反对通过这一提案。在1938年4月20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施中立法才能保持中立的观点。他坦率地指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僵硬地执行中立法，“也许意味着一种彻底的非中立”。他承认在中国实际上正进行着战争，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但是中日还没有断绝外交关系，那就不必把它称为战争。在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现在正同时进行的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采取两种不同的对策，即只对前者实施中立法时，罗斯福坦率地说，两者情况不同，如对西班牙战争不实行禁运，将有利于佛朗哥（F. Franco），因为他控制着海洋，而“如果我宣布中立法适用于中日战争，它将会有利于日本而伤害中国”<sup>②</sup>，当时，中国正通过各种渠道在美采办战争所需物资。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

① D·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间的远东危机》（D.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剑桥1964年版，第625页。

② 《罗斯福与外交事务》，第9卷，第440—441页。

在各界明智人士的支持下，孤立主义者欲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的企图未获成功。

但是，由于中立法的存在及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活动颇受掣肘。在援华和制日两方面，美国最先迈开的是制日的步伐。这是因为这更容易找到直接的借口，由于日军在华犯有大量野蛮暴行，美国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由对日本从美国的进口进行限制，这就避开了中立法问题。而援华则涉及到对中日战争中的一方的倾向性，较易引起复杂的反应。

须知，基于战前美日贸易的规模，美国仍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最大物资供应国。出于各种原因，在尽力避免引起日本敌意和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反对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可能对日实行制裁。然而，在1938年夏季，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终于迈开了限制日本的第一步。这一步是以谴责日本在中国对平民的狂轰滥炸为突破口的。

6月11日，国务卿赫尔（C. Hull）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而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劝阻向那些用飞机来轰炸平民的地区出售美国飞机。”<sup>①</sup>7月1日，国务院向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商发出了劝告信，表示：“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任何从事那种轰炸的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国家出售飞机或航空设备。因此，国务院将极不乐于签发任何授权直接或间接地向那些正使用军队攻击平民百姓的国家出口任何飞机、飞机用武器、飞机引擎、飞机部件、航空设备附件或飞机炸弹的许可证。”国务院还要求那些已与外商签约而难以中止契约的厂商，向国务院通报其合同的内容，“无论其是否已有许可证或是正准备申请许可证”。<sup>②</sup>

国务院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它并不具有强制性。从理论上说，如有厂家执意要申请那种许可证，国务院也是不得不予批准的。但是，政府的这一姿态毕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① FRUS, 1938, II, 236—237.

② 《罗斯福与外交事务》，第10卷，第290—291页。

绝大部分厂家都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据副国务卿韦尔斯(S. Welles)12月13日给罗斯福的一份表格表明,“道义禁运”取得了较大成功。下表为报告中所附1938年6月至10月美国向日本输出飞机及有关部件的情况。

月份	价值(美元)
6	1710490.00
7	1125492.65
8	179249.00
9	78720.00
10	7215.95

韦尔斯报告说,在6月之后,国务院所签发的出口许可证“几乎为零”。<sup>①</sup>

罗斯福对这一状况并不满意,因为仍有个别厂家不执行“道义禁运”,如美利坚航空公司就仍在与日本作大宗生意。罗斯福致函韦尔斯,要求他想办法进一步削减对日本的出口。韦尔斯决定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这家不执行“道义禁运”的航空公司的名字,以期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这家公司停止对日出口航空物资。

应该指出,在限制航空品出口的同时,美国仍有其它的军用物资大量流向日本。这就是说,美国并未摆出要与日本决裂的架势。但是,航空物资的限制毕竟是在对日制裁方面迈出了实在的第一步,是对日本发出了第一个警告。

比较起来,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则要显得困难些。抗战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财政上的支持是通过购买中国白银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在实行币制改革后,白银退出流通领域,中国政府手中握有大量过剩白银,它急于在国际市场上售出以换取外汇。对美国来说,通过购买这些白银来支持中国可以避开孤立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它不象提供贷款那样具有明显的援助性质。美国多次购买中国白银,从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一年时间内,共分6批购

<sup>①</sup> 《罗斯福与外交事务》,第12卷,第300页。



买了31200万盎司白银,其价格略高于国际市场价,总价值达13800万美元。这些售银款项原曾规定不得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其中约有4800万美元被用于采购军事物资。<sup>①</sup>

不过,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交涉却迟迟未有进展。早在1938年初,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就向美国政府提出借款5亿美元的要求。但赫尔声称,任何借款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而现在看不出国会会有批准的可能,政府行政机构对此无能为力。由于美方在借款问题上过于谨慎和消极,迄至1938年夏,中美间的贷款交涉未有任何重大进展。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还拒绝了一次英、法外交部希望三国同时宣布向中国提供借款的建议。赫尔在给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J. Kennedy)的指示电中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联合行动或集体行动会激起日本人的反感,而有碍于目前中日冲突的解决。他认为,各国单个的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援助将更为有利。赫尔同时通知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有关对中国的援助问题。<sup>②</sup>

确实,美国国务院内这时正在就援华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出现了很有说服力的要求援华的呼声。前述范宣德的备忘录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另一方面,美国驻华人员这时也力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詹森大使在1938年6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美国应在反对世界恶棍的斗争中挺身而出。詹森指出:“民主世界正呼唤着一位领袖,他要能在法律和秩序的进程中清楚地以领袖的身份去思考,以领袖的语言去讲话。那就让他屹立在美国吧,如果他注定要在那里出现。”<sup>③</sup>史迪威武官从美国国防的角度力主援助中国。他认为,“我们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产本国需

① A·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A·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剑桥1963年版,第62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09页。

② FRUS, 1938, Ⅱ, 537.

③ 《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第137页。

要的国防装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费用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sup>①</sup>史迪威认为,美日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中国将来必然是美国的盟友。因此,他在这时已经开始收集资料,注意发现中国军队中的能干的指挥官,以判断哪些部队和哪些指挥官在中美一旦联合作战时能发挥重大作用。他坚信中国军队如果能在训练、装备、计划和指挥等方面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它一定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

在美国的有识之士中,财政部长摩根索(H. Morgenthau, Jr.)对推动美国政府提供援助一事尤为热心。7月26日,摩根索在赴欧期间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表示了提供贷款的可能性。他说:他两年前与中国签订白银协议时,与中国代表陈光甫合作得很愉快。如果中国现在派遣陈光甫到美国去,双方可以就一笔农产品信用贷款进行商讨。

顾维钧立即向重庆报告了这一信息。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对谈判结果怀有极高期望。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给陈光甫的指示中说道:“此次战争胜负之决定在于财政,如能取得一项数目甚大之现金援助,即可改变局势。”孔不知底里,竟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四亿美元的借款目标。<sup>②</sup>按照美方的安排,陈光甫于9月离华赴美。摩根索亲自负责财政部与陈光甫的谈判。他认为这是美国能够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的最后机会,因为中国的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危急。

财政部的这种积极行动受到了对贷款持谨慎态度的赫尔国务卿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可能会违反中立法,引起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和日本的反感。面对来自国务院的反对意见,摩根索诉诸罗斯福总统。1938年10月17日,摩根索致信罗斯福,批评那种“主张不做任何可能遭到侵略国家反对的事情的僵硬外交政

① 巴巴拉·奇塔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5页。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710页。

策”，使得他对于援助中国所作的努力归于无效。他问道：“有什么样的和平力量能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为伟大呢？”他认为，为了“有助于保卫美国未来的和平，美国应当运用它巨大的经济力量”。他指出，“若不迅速提供实质性的经济援助，中国的抵抗运动不久就会瓦解”，而美国“只要承担略高于一艘战舰的价值的风险，我们就能带给中国人持续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我们所能做的要比这多得多。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能推动世界各地民主力量反对侵略的斗争”。<sup>①</sup> 摩根索不时向罗斯福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以期取得总统的支持。

### 三

当有关对华贷款的争论仍在进行之时，日本从反面推动了这一贷款的成立。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中国的广州和武汉后，自认为对中国战争大局已定，遂对其外交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挑战。而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在行动上早已否定了“门户开放”，但迫于压力，在口头上仍予以尊重。11月3日，日本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开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的新形势”，并声称日本要“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sup>②</sup>

日本意在以所谓新秩序来取代旧有的远东华盛顿体系，实现它对东亚的独占。11月8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 Grew）的照会中公然提出，“目前在东亚新形势继续发展的时候，企图……毫无变更地应用在这次事变前的形势下适用的观念和原则，并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sup>③</sup> 日本《国民日报》对所谓“东亚新秩序”作了十分露骨的注解。该报扬言：“东亚新秩

<sup>①</sup> 《罗福斯与外交事务》，第11卷，第390—392页。

<sup>②</sup>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1955年版，第401页。

<sup>③</sup> FRUS, Japan, 1931—1941, I, 797.

序’宣言，就是‘东亚门罗主义宣言’，列强坚持保留其在华权益是错误的，它们希望恢复事变前的权益，纯属幻想。所谓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都必须加以修改。”有的日本报纸甚至还公然宣称，现在摆在列强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问题，而是一个“谁将是西太平洋的主人”的问题。<sup>①</sup>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则直言不讳地声称：“刻下日本之根本任务为建设新中国。所谓新中国者，实质上亦即第二满洲国。”<sup>②</sup>

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宣布，使美国的政治家们对日本要独占中国的意图不再有任何怀疑。美国国务院内资历最深的远东问题专家、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亨培克，在11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日本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除非日本的进军被中国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制止，否则，美国和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他认为，现在光靠发表声明或议论已经无济于事，日本人的侵略“只能被物质的障碍和物质的压力所组成的抵抗力量所制止”，美国可能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但我们在那一领域的胜利并不能阻止日本军事机器的前进”。美国现在越不肯对日本施加物质压力，它反而越可能在将来不得不与日本兵戎相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综合运用外交的、经济的和潜在的军事的压力。<sup>③</sup>

在这同时，身在中国得以近距离观察中日战争的美国情报人员也不断向国内发回类似的警报。兼作罗斯福总统特别情报员的卡尔逊在11月15日给罗斯福发去的报告中表示了他的忧虑：“我正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在这场冲突中远不止仅有商业利害关系。日本在中国越深入，它的计划就越明显，它想发展成为一个能够统治世界——当然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帝国。如果它把

① A·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A.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8年第1卷，伦敦1941年版，第496—497页。

② 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年版，第594页。

③ FRUS, 1938, I, 572—573.

中国的人力和经济资源控制在手，它将会建立一支使它能够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完整的陆军和海军。”卡尔逊认为，“中国的独立对于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的和平——亦即美国的和平是极为重要的”。他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未能采取联合的经济压力措施表示遗憾。<sup>①</sup>

与美国的援华呼声相呼应，刚刚丢失了广州和武汉重镇，遭受重大军事失利的中国政府，迅速向世人作出了坚持抗战的明确表示。10月31日，蒋介石发布《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宣告“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文告要求中国军民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而造成最后之胜利”。<sup>②</sup>

11月30日，摩根索和韦尔斯联合向罗斯福总统陈述对华贷款的必要性<sup>\*</sup>，罗斯福最终批准了桐油贷款计划。该计划采取了一些技术性措施。为了避免桐油贷款被人认作是给中国政府的政治性贷款，建议由中国在国内组织复兴商业公司，在纽约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再由该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契约，从而使之在形式上成为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美国银行间的商业借款契约。

12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公开宣布给世界贸易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次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正式合同。这笔借款年息四厘半，期限为5年，由中国银行担保。复兴商业公司负责在5年内运送给世界贸易公司22万桶桐油，由后者在美国出售，售得价款的半数偿还借款本息。<sup>③</sup> 合同指定借款只可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及工业品，不得

\* 其时赫尔已出国去利马参加美洲国家会议。

① 《罗斯福与外交事务》，第12卷，79页。

②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1984年版，第301—306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28—1130页。

用以购买飞机、军火。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进口那些可作军事用途的货物并未加以限制。

桐油贷款数额虽然有限，但作为战时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美国援华的开始，对于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鼓舞作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认为，桐油贷款具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它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他指出，“此款成于我国力最倒霉之时，其富于政治意义至显”。<sup>①</sup> 蒋介石为此专门给胡适和陈光甫发去慰问电，内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赖之”<sup>②</sup>。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裴克（W. Peck）在12月24日的报告中描述了贷款在中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他写道：“美国对华信贷的提供和有关英国类似行动的报告，已被中国人解释为预示着这些国家阻止日本在远东得逞的运动的开始，现在似乎很显然，这一信念已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人持久抗战的意志。”<sup>③</sup>

美国的贷款行动对日本也是一个打击，日本并不掩饰它的不满和不安。尽管格鲁奉命向日本证明贷款“是一个为美国的企业家服务的商业信贷”，但有田八郎还是把它称为“令人遗憾的行动”，并对此加以反击说：“日本民众也许会把这一贷款视为一个经济强国实际上所施加的经济压力，其结果将与美国所期望的完全相反，至少日本民众无疑会找到新的根据来强化已经提出的东亚新秩序。”<sup>④</sup>

在采取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同时，美国还在外交上对“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进行反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11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FRUS, 1938, II, 435.

④ 《中国与援助之手》，第83页。FRUS, 1938, II, 589—590.

21日下午，格鲁会见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指出：“无论哪国政府，都不能自以为世界上一个广袤而重要的区域该它独霸，由它独断专行；任何政府要这样做，不管其动机如何，到头来都必然是误国害己，也危害别国。”格鲁并表示，美国政府“亟欲采取步骤，以阻止当前的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趋势。”<sup>①</sup>

12月30日，格鲁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一份措辞坚定的照会。照会指出，机会均等等原则是过去列强共同承认的，不容由某一方的片面行动加以取消。照会批驳了日本所谓“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说法，指出，形势的改变“是由于日本的行动所致”，“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那里的掌权者和司命者”，美国“不能同意建立一个由第三国所策划，且为该第三国的特殊目的而设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将会专横地剥夺美国久已拥有的机会均等和公平待遇的权利”，“美国政府和人民不能同意任何美国的权利或责任被任何别的国家的当局或代理人的专横行为所废止。”<sup>②</sup>

美国政府对于“东亚新秩序”所持的强硬立场是空前的，密切注视着美国反应的中国政府敏锐地注意到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变化。中国官方的中央通讯社称：美国照会“义正辞严，毫不宽假，可谓中日战争以来第三国对日本最强硬之表示，亦可谓近一年来美日在远东关系上之总清算也”。<sup>③</sup>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也认为，美国对日照会“态度强硬坚决，为向来所未有”，他乐观地展望未来，“故以后发展应较顺利，英美合作更无可疑”。<sup>④</sup>

当然，历史的实际进程并不如国民政府某些人士所预期的那样乐观，那样顺利。受欧洲时局及自身军事实力等因素的影响，

① 约瑟夫·C·格鲁著，蒋相译译：《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

② FRUS, Japan, 1931—1941, I, 823—825.

③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33页。

④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32页。

至少在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以前的一年半中，美国的对日制裁并没有迅速扩大，对华援助也没有接踵而来。可以说，美国援华制日的步伐仍是缓慢的。然而，这步伐虽然缓慢，但却终究是一步步地向前迈了下去。援华制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美国远东战略的发展方向。1938年是这一战略的起步之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